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02

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的机遇和挑战

王秋梅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新轴心时代与旧轴心时代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区别, 新轴心时代与中国道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新轴心时代既使中国道路获得了创造性传承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和平发展的新文明形态、使传统文化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等机遇, 又使中国道路遭遇了如何正确认识复古、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西化三种改革路径, 以及话语影响力与国家实力不匹配、文化不自信等挑战。

关键词: 新轴心时代; 中国道路; 新文明形态; 话语影响力;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1-0009-06

引用格式: 王秋梅. 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的机遇和挑战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1): 9-1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Path in the New Axis Era

WANG Qiumei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axis era and the old axis era, and the new axis era has an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 path. In the new axis era, China's path has gained opportunities to creatively inherit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ribute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make the possibilit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 reality. It has also encountered challenges such as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three reform paths of restoring ancient ways, returning to classical Marxism and west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mismatch between discourse influence and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lack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New Axis Era; China's path; new civilization form; discourse influe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时期, 其中, 第三时期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心, 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中国、印度、

西方三个轴心文明。自从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以来, 各国学者和思想家都在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重温先哲经典, 认真思考当今时代的各种变化、特点和需求。新轴心时代已然降临,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研究”(18AZX00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微传播研究”(2015M572634XB); 广西哲社规划研究课题“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与预防机制研究”(15BKS0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教技厅函[2018]126号)

作者简介: 王秋梅(1978—), 女, 广西南宁人, 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意识形态。

希伯来大学的艾森斯塔特教授、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都持赞同的观点。汤一介教授在诸多的论文和演讲中,提出了三个论据来阐明人类社会进入了新轴心时代: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特身份的重要支柱;第二,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各自独立发展;第三,就当前人类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在全球意识关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1]

一 新轴心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关系

新轴心时代与旧轴心时代,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共同点表现为:两个轴心时代都是多元文化、多种文明并存,这些文化、文明都对各自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并对各国各民族有一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同之处在于:旧轴心时代产生的几个文明是在相互隔绝的环境下产生的,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没有交流,而新轴心时代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文化交流碰撞频繁。旧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发生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伟大的精神导师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更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更神奇的是,虽然几大文明之间互无联系、互无知晓,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些没有实现精神重大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最后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变成文化的化石。人类开始凭借轴心期所创造的文明生存、生活,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复兴提供了人类文明前进的精神动力。新轴心时代容纳多种文明的存在,反对西方一元论、西方中心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复兴,文明之花再次竞相开放。虽然西方文明曾经独领风骚几百年,但是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分裂、文化呈现差异的世界。旧轴心时代西方文明圈、印度文明圈、中华文明圈

各自孤立发展,而新轴心时代则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网络飞速发展,世界连成一片,各民族在相互影响下形成多元文化共存、频繁密切交流的局面。面对新轴心时代到来的历史机遇,中国要实现弯道超车,既要有传承,更需革新,必须走一条跟以往、与他国不同的道路。

中国的新轴心时代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并未结束,这与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中国道路不是隔绝于人类文明大道之外的,更不是游离于新轴心时代之外的。从历史的纵向维度看,1840年是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在选择道路历程中,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实践活动,经过将近180年持续的探索,中国不拘泥于马恩经典学说,也未照搬苏联模式,既没有简单复古传统,更没有选择西方发展模式,而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在对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70年的历史经验持续探索的结果,是对近代以来将近180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渊源和迫切的现实发展需要。从人类文明的横向维度看,中国道路的成功证明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深厚内涵。人类文明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共同构建的有机整体,人类文明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征。中国道路打造的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开创了一个由民族性、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中国道路也必然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近代以来确立的中国道路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道路的探索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这一道路是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中国道路的发展不仅仅是要进行经济建设,更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人类的普遍价值追求。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多元文化互动、科技革命不断兴起的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不可能脱离于这一时代,而是要对这一时代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中国道路既具有中国特色

的特殊性，更具有新轴心时代人类的普遍性。

二 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面临的机遇

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只有中国跨越了全部四个阶段。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到第二阶段灭亡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当前中国面临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期叠加的情景，这构成了中国道路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如何应对西方早已开启的科技工业文明、勃发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文明、正在萌发的人工智能文明，在这样的关键时代，中国是崛起前行还是沉没后退，这取决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机遇常与挑战共生并存。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曾是中国的轴心时代，为之后2000多年中国的灿烂文明奠定了基础。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应对好了，1840年以来的历史时期，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在对新轴心时代的未来憧憬中，人们大体都有一个判断，整个人类社会虽然在经济生活方面会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但在精神文化方面更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格局。

新轴心时代使中国道路打上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其表现为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文明。中国道路不是凭空产生出现的，而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其最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起来的，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雅斯贝斯认为，在轴心时代出现之前，虽然人类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并有了许多发明创新，但作为人的最根本标志的自我意识还没觉醒，因而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人类的历史，轴心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形态。雅斯贝斯非常重视轴心期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直到今日，人类仍然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复归到这一开端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2]中国道路的确立和拓展，尤其离不开对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依赖。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的创造。这种“前提和条件”，既包括“经济的前提条件”，这是

起“决定性”作用的，但同时，“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3]中国道路蕴涵着深厚的和平文化基因，比如，“和为贵”“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睦邻友邦”“天下大同”等思想价值观念。这种和平的文化基因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华文明延续5000多年经久不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未中断，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大的穿透力，对今天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拓展仍然发挥着深刻的文化影响作用。中华文明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一样，都属于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国道路，实质上是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同时也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历史悠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中国道路的文明基因。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成功选择和不断拓展，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向世界贡献了和平发展的新文明形态。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可以看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对外开拓殖民地，用坚船利炮打开落后民族的国门，掠夺巨量的财富。其利用赤裸裸的霸权手段和殖民政策，为抢先进入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西方强国在率先完成现代化之后，利用先前积累起来的优势，建立起各种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变相地强行向各发展中国家推销其发展模式。在由西方文艺复兴、大航海、工业革命推动的新轴心时代，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进攻，落后国家既不能与世隔绝发展本国经济，又不能公平地融入全球化进程，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中国道路的成功，使西方世界主宰和垄断人类文明的神话破灭了，意味着西方不再是现代化发展的唯一范本，更不是非西方民族马首是瞻的先进坐标。中国道路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成为新轴心时代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新坐标。较之以前的文明形态，西方工业文明是文明的高级形态，但其所蕴含的斗争与对抗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还不会太平，人类文明仍然充满着冲突，他将这种冲突笼统地归结为“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

间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那么,人类文明注定处于这种冲突、对抗的状态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必然是在斗争和对抗中实现的吗?中国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为人类文明指出了和平发展的新路。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就中国道路这一新生的文明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来说,中国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希望,是对人类文明的再创造,标志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的诞生。中国道路的开辟和拓展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世界性,其坚决不靠殖民掠夺、战争、剥削来发展,而是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坚持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不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决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状态,最终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目标,向世界诠释了一种崭新的文明进步和发展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4]

中华民族向来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有着热爱和平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信奉的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的价值观,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肯定会与和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这种联系属于密切的联系,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传统对当今中国的和平道路也仅仅是提供了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必须具有现实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当今中国的和平主义道路并不是中华文明自然的产物,它并不是从中华文明固有的文化基因直接引申出来的,当今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结果。”^[5]因此,可以看到,中国道路之所以是和平发展的道路,除了取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外,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跟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迥然不同的独特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创造的新文明不以资本为原则,中国的发展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还会限制和超越资本。西方工业文明使人的发展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中国道路不仅是以满足人的低层次的需求为目标,更以满足人的高层次的需求为宗旨,让人进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境界。总之,

中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有着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目标和方向。这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发展必然是一种和平的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并逐步理解和接受。

三 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遭遇的挑战

过去数百年,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独霸天下。令人吃惊的是,不仅西方人,很多非西方人也有意无意地相信,西方哲学、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等代表着普遍的人类文明形态。文艺复兴开启了近现代西方的科技工业文明,这一新型文明的意义绝不逊色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航海运动把这种新型文明推到了全世界面前,从而将全世界都推进到了新轴心时代。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存续发展其原因在于挑战与应战。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面对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挑战,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有效地应战,这种文明就能存续和发展,相反,则可能夭折或中断,如玛雅文明等。新轴心时代,多元文化并存,多种文明竞争,思想观念千帆竞发,观点表达百舸争流,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新轴心时代这一鲜明特点,让中国道路遭遇了必须应对的挑战。

其一,新轴心时代使中国道路遭遇了如何正确认识复古、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西化三种改革路径的挑战。将近180年来,中国大体上一直处于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思潮涌向中国,当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多种社会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呈现出一个文化多元的新格局。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6]汤一介认为,展望21世纪,无论中外,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断变换,都不太可能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那样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的伟大思想家。进入新轴心时代,有人曾为中国提供了复古、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西化这三套改革方案。复古方案,要用,但如今其不完全管用,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以古人的智慧来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西化方案，可以借鉴，但其对中国不适用。中国没法躲避现代性，但不意味着一定要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方案，我们认为，老祖宗管用，但不够用，我们不能要求老祖宗来解决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道路面临的挑战与冲击，不仅有来自于西方的娱乐文化如好莱坞的大片、消费文化如麦当劳的薯片、科技文化如英特尔的芯片，也有来自于内部的自我怀疑、否定。面对这一系列挑战，中国道路的成功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立足中国国情，有效地进行了应战。

在发展的历程中，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中国的独特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又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的路子。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模式，否则注定要失败。中国道路要想超越西方文明，又保持自己的特色，必须科学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尤其是要“宣传阐述中国特色”。而“宣传阐述中国特色”就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国在吸取其他文明精华的时候绝不能失去自我，中国有能力把别人的优秀东西进行吸收和转化，但绝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能简单地重复西方现代文明，我们要创造出文明新形态，不断地对人类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其二，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面临着话语影响力与国家实力不匹配的挑战。2010 年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道路的成功让世人瞩目，成为热议的话题。但是，

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相应地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仿佛是一个行动的巨人、话语的侏儒，中国奇迹与话语贫困的悖论构成了一个让人费解的奇特景象。这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全球话语权的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内众多学者都认可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挨骂”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世界各国可以随处可见中国生产的商品，但缺少被世界认同的中国话语。尽管中国进行了大量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积攒了丰富的理论话语资源，但仍然有一些人盲目地照搬照用西方理论和学术话语来削足适履地评价中国道路。中国尽管已经贡献了与世界交流的物质文化，但目前我们更需要创造出全面深入生动讲述中国发展故事的精神文化，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与影响力。

中国道路的成功，并没有相应地使中国的话语体系承担起为中国崛起所应该赢得的合法性、正当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虽然要搞市场经济，但是缺乏引领这样一个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中国的改革不会成功。她还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覆盖世界的文化。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输出任何思想与主义。撒切尔夫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断言中国改革不会成功，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但她所说的中国没有向外输出思想，则指认了一个事实。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价值观的崛起。比如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柯白就认为，中国道路遭遇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困境，中国的软实力微乎其微。他说：“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别的道德或规范意义，迄今及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向世界呈现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但它们不可能包含高调的哲学理论与意识形态。”^[7]柯白完全抹煞了中国道路的哲学价值，这是片面的。不过，柯白的批评对中国道路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那就是研究中国道路问题，必须追问中国道路的哲学价值，而不是局限于呈现自己的“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中国道路自信，决不是一种现象的张扬，或经验的自我夸张，更不是一种精神意志的自我满足，甚至自以为是。中国道路自信，就是把中国道路中那些自在的潜在精神揭示出来，上升为自为的或自觉的价值

理念。中国道路决不是一种没有价值观的崛起,研究中国道路的价值必须把中国道路中那些自在的潜在精神揭示出来,上升为自为的或自觉的价值理念,才能真正建立四个“自信”。

其三,新轴心时代中国道路仍然面临着文化自信的挑战。旧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文化极度繁荣的时期,通常称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代,孔子、老子、韩非等人在那个时代为中华文明留下了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正因有了孔子,世界上才会有延续两千年的礼仪之邦;正是有了老子的出现,后来的诗词、书画才能有如此清新脱俗的意境;也正是有了韩非,中国在历史上每次分裂以后还能重归大一统。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汉唐以来,国力的强盛和灿烂的文化,使得中国一直对东南亚周边国家保持文化优势,并有持续的文化输出。古代中国是很多外国人向往的国家,中华文化是很多人崇拜的对象。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古老中国迅速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面对西方强大的攻势与入侵,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存亡,无数优秀的有血性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地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的强国之梦最终破碎了。直到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才使得拥有5 000年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重新在世界面前站立起来。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沧桑、苦难、挫折,也使得一部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经受了巨大打击。时至今日,面对中国道路实现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大实践,面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些国人依然不够自信,依然念念不忘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中国自身的文化和价值缺乏足够的底气。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有成功的发

展模式,面对西方,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经常挨打,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长期落后,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说话不够硬气。随着中国道路的成功推进,已经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如果说打开国门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人仰视西方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还是动不动言必称美国如何、西方如何,就让人贻笑大方了。一个只会使用别人的话语来说话的民族,只会仰视别人文化的民族,在世界上是难以立足的,是没有什么份量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发展、对于国内外问题的认识理解,应该在借鉴别人经验智慧的同时,敢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加以判断,用自己的一套话语进行叙述和传播。对于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我们要敢于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名正言顺地通过讲道理、摆事实,从两种文化、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对比中说明自己的独特之处和先进性。

参考文献:

- [1] 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6):10-11.
- [2]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6.
- [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8.
- [5] 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2(3):12-13.
- [6] 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下的文化超越[J].人民论坛,2008(16):20-21.
- [7] 柯白.激辩中国道路:世界中国学论坛观点集粹[J].社会观察,2013(4):8.

责任编辑:黄声波